

研究有助于在今后的救灾工作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以史为鉴,尊重客观规律,以便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救灾保障制度。这对新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对灾害的记录要比前代更为详细,留存的资料也更为丰富,这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对清代新疆自然灾害史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而且可以推进学术界对西域史和边疆史的研究。其四,分析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清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探讨清政府的荒政和民间的备荒以及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迁徙、民族关系、社会稳定等问题的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清代新疆社会的全貌和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政策。

“周武王与牧野大战”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获嘉县政府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获嘉县古宁邑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单位承办的“周武王与牧野大战学术研讨会”2011年8月24—25日在获嘉县举行,来自国内的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对牧野之战中《牧誓》考辨与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与盟誓文化、周武王历史地位与评价等方面的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5篇,现就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牧誓》考辨与牧野之战研究,是本次提交论文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周武王与牧野之战的几点认识》探讨了伐纣时间、商周双方的军事力量、牧野的地望、牧野之战的历史意义和牧野文化的前途等问题。中国殷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大邑商与牧野》认为“商”是一个与东西南北四方对等的概念,“商郊牧野”之“商”应指的是“大邑商”,而不应理解为商都(殷),“郊”应为“大邑商”的“郊”而非商都的“郊”;“牧”和“野”应作相似的理解;牧野之战中,商纣王在大邑商的中心地带——殷,也许是不设防的,所以牧野战败后,商王纣毫无抵抗之力,登鹿台自焚而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徐凤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天文学方法与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将武王伐纣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原因做了解释与说明。文章认为,公元前1044年得出的金文月相词语含义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金文月相词语专题研究的结论相违,是断代工程最后选择了公元前1046年作为武王克商之年的主要原因。而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光则对将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提出了异议。他的《武王伐纣年代再探——从刘歆〈世经〉出发》认为,将武王伐纣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111年较为合理。西周所用的历法与牧野大战时间的确定关系极为密切,这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徐州师范大学叶正渤《武王伐纣与西周年代研究》认为,西周史上的共和虽行,但既没改元,也没有单独纪年,更谈不上当年改元,用的仍是厉王的纪年,故厉王的纪年应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是51年。

武王的进军路线是牧野之战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

究所张新斌《武王伐纣与牧野大战的历史地理问题》强调了历史文献、地名传说和文物古迹考察的有机结合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郑州大学王星光、张强的《地理环境与武王伐纣进军路线的选择》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武王的进军路线进行了解读。文章在对商周之际鄘地黄河故道重建及商周之际气候条件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武王伐纣时连续降雨导致了黄河的涨溢,而现河南新乡在商周之际距黄河仅10华里许,黄河的泛滥使宁(获嘉)至新乡一带正处在黄河的泛滥地带。考虑到黄河泛滥所导致的道路泥泞、结合牧野的地望所在,武王做出了出师获嘉、北上取道百泉,然后径直向东,与殷军大战于今卫辉北边的牧野。地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重要的因子极大影响了牧野大战的进程。从地理和环境因素对牧野之战进行研究是值得重视的新视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世之《武王伐纣过宁及其相关问题》对武王伐纣行军路途中,“宁”(获嘉)的地望进行了考辨。

《尚书·牧誓》是有关武王伐纣的重要文献,自然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河南大学陈昌远《读〈尚书·牧誓〉》对《牧誓》文义作了探讨,并评论了郑康成的相关注解。苏州大学周书灿《〈牧誓〉蜀濮地望新考》认为,周原甲骨文卜辞之“蜀”即《牧誓》之蜀,周初在今陕西汉中一带,《牧誓》之“濮”,在西周初期大致位于楚、豫之间的汉江平原地区。

“清华简”作为新出土的材料也同样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宫长为《谈谈武王纪年问题》对“清华简”和《尚书》关系作了分析。南开大学朱彦民《“清华简”“武王勘黎”考辨》认为,“武王勘黎”在今黎阳浚县的说法是不足信的。“黎”地应在殷都西部、晋南上党一带。盖商代黎侯是一叛服不常的方国,所以文王勘之,武王亦勘之。

在武王伐纣与盟誓文化研究方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尚书〉反映的上古会盟及盟誓活动》认为,《金縢》是一篇极典型又珍贵的反映人世和上天之间特殊盟誓关系的文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论商末西周的会盟》对商末西周时期的会盟程序和会盟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李晓燕在《从武王盟誓看先秦时期的盟誓文化》中认为,先秦时期的盟誓具有法律效力,带有明显的神灵监督和裁判色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庆《论牧野之战的战争艺术》、中国武警学院石宝江《对“牧野之战”战争性质的再思考》、天津图书馆王进《浅谈周灭商中“伐谋”、“伐交”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启示》、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勇《姜太公二三事》及郑州师范学院刘玉娥《牧野之战用兵方略浅议》等文,从军事理论的角度对牧野之战进行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义华《武王克商后对殷遗民的控制策略》认为周武王通过分割商畿、分化和迁置殷遗、设立三监、分封诸侯、营建洛邑等措施达到了军事威胁、抚柔安慰、分割削弱、以敌攻敌进而维护战果的目的。这些措施和政策为整个周代的商遗政策定下了基调,后来演化为周人对付商人的基本政策。经周公、成王等的继承和进一步加强,最终确立了周人稳固的天下共主地位。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对牧野大战的时间、地望、进军路线、性质和历史意义及与牧野大战相关的其他问题均有探讨,将进一步推动先秦史的深入研究,但与会专家认为,上述几方面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尚需学界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张 强)